

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98-2094-0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共六大(1928)—代表—回忆录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972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复 审: 王世英

终 审: 赵建忠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210mm×295mm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数: 1—1300 册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094-0

定 价: 75.00 元(精装)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李忠杰

编委会副主任 霍海丹

主 编 李 蓉 杨 青

编 辑 李 蓉 杨 青 张 侃 刘慧娟 龚颖燕

目 录

- 龚饮冰 回忆接待六大代表 1
唐韵超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3
黎国忠 忆广州的革命斗争和参加中共六大 7
罗 明 出席党的六大和传达六大精神 10
瞿秋白 谈党的六大 14
周恩来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16
李立三 在六大上 30
黄 平 出席六大 32
邓颖超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36
张国焘 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39
罗章龙 参加中共六大 48
胡均鹤 我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58
杨 干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60
李培之 和王若飞参加中共六大前后 64
涂作潮 在莫斯科旁听中共六大 67
法荣廷 我的经历和参加革命的原因 73
汤正清 我的家庭和到俄国学习的愿望 75
饶卫华 我参加六大的回忆 77
高理文 难忘的历程 79
王 翹 有关中共六大的实况 86
杨之华 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 90
李文宜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92
陈永清 参加中共六大前后 97
龚德元 对中共六大的回忆 102
丁基实 参加中共六大的回忆 106
何秀明 我参加革命和中共六大的回忆 111

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

乌兰夫 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共六大前后 114

附录一：其他人物的回忆

李维汉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125

瞿独伊 我记忆中的中共六大 143

附录二：六大代表在六大

邓中夏在六大 144

关向应在六大 146

胡福田在六大 147

王若飞在六大 149

王凤飞在六大 152

瞿秋白在六大 155

周恩来在六大 165

李立三在六大 171

苏兆征在六大 174

邓颖超在六大 177

蔡和森在六大 181

张国焘在六大 183

项英在六大 189

周秀珠在六大 196

刘伯承在六大 197

毛简青在六大 199

王仲一在六大 203

王明在六大 208

沈泽民在六大 211

秦曼云在六大 213

张世熙在六大 223

杨之华在六大 230

汪泽楷在六大 232

乌兰夫在六大 235

后 记 236

回忆接待六大代表

龚饮冰

1928年,我和蔡畅大姐、郭某某,还有一位同志,我们四人作为六大代表,由上海出发,经大连到哈尔滨去莫斯科。六大代表是分批分期走的,当时,大连至长春为南满铁路由日本人控制,日本当局查得很严,有几位曾被扣押。当时没有国际交通站,由哈尔滨地下党负责接送六大代表的任务。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个卖估衣的商店里,它与哈尔滨地下党不发生直接联系。我们到哈尔滨后,找到这家估衣店,进屋后拿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对方见到暗号符合就接上关系。由他们安排我们住进一家山东人开的小客店里,然后,给我们换上本地服装,脱掉上海的服装。从哈尔滨到苏联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满洲里,一条是走绥芬河五站。不久,就给我们买来去满洲里、五站的车票。我走的是绥芬河路线。下车后,是一个家境很贫困的俄国人接待我,在他家休息、吃饭后,当晚就过境。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到了苏联境内的一个火车站,在这里乘车到海参崴,然后转乘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火车是烧木样子,车速很慢,由海参崴到莫斯科要走一个多月。

六大会议以后,中央要我们在哈尔滨设立交通站,做护送代表回国的的工作。于是,我、李

立三、向忠发、苏美一4人第一批回国,途经满洲里到哈尔滨。我负责交通站的设立,也是在道里开了一家估衣店,并指派苏美一负责。交通站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姓白的朝鲜同志,他原在上海作翻译工作,这次派来做交通站的工作,表现出色。另一个是傅某某,江西萍乡人,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懂法语和俄语,这个人在哈尔滨工作很负责。他在道里开了一个“彩霞湘绣庄”。苏美一原是在苏联读书的学生,六大领导同志说他很精明强干,又会俄语,所以带回哈尔滨做交通站的负责工作。不料,此人胆小如鼠,第一次去估衣店,由于心慌,错开别人家的门,门未大开,便以为接待站被破坏了,于是便离职逃跑了。姓白的同志在一次完成护送过境任务时失踪了,估计是在路上被胡子抓去杀害了。傅某某在九一八事变后,由道里搬到道外,仍开“彩霞湘绣庄”兼做镜框,继续担负交通站的工作。

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日本后,在东北的苏联人都撤回国内,傅某某找不到与苏联接头的人,和上级组织联系不上,就把铺子交给他儿子看守,自己到北平找组织。后来,我与他的联系也中断了。

六大会议结束后,有一些代表留下学习或工作,其他代表采取分散回国,有从满洲里入境

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

的,也有从绥芬河入境,还有人偷越边境回来的,设在哈尔滨的接待站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据说,周恩来就是从绥芬河入境的,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又参加7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直到10月才从苏联回国。一同回来的还有罗章龙、王德三同志。他们是通过绥芬河入境的,由于昼伏夜行,又逢大雨,衣服和捆在腰里的文件都淋湿了。路经哈尔滨时,决定暂

住几天,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当时,周恩来住在天津南开学校同学吴玉如家里。罗章龙被安排住在第三中学图画教师韩乐然的宿舍里。王德三是云南人,与楚图南是同乡,便投奔了楚图南。几天后,他们离开哈尔滨去上海。

选自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哈尔滨与红色之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龚饮冰 1896年9月28日生。湖南长沙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参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帮助建立湖南的国民党组织。1927年7月起负责中央与广西党组织机要联络工作,多次往来广西和上海之间,11月参与制定百色起义计划。1928年夏赴苏联莫斯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前后在哈尔滨负责代表的接送工作。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伪统治区和国民党区从事秘密斗争,直到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轻工业部党组小组书记、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1976年6月26日在北京逝世。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唐韵超

我原名唐宏经，曾用名唐圣修、唐福山、金涛、金红。1901年3月1日出生于辽宁金县董家沟一户农民家庭。16岁时，因家庭生活贫困，经人介绍，到大连日本人开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大连的爱国知识分子于1920年和1922年先后倡导和组织成立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和“中华增智学校”等进步团体。他们在教授青少年文化的同时，也组织社会青年学习新文化、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我报名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特别是1922年5月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罢工斗争迭起。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大连工人阶级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受到强烈震动，认识到要想不当亡国奴，不受日本人的欺压，就要像关内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团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3年12月2日，我和工厂里的几个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大连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全市性地方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我被选

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并于1926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大连“福纺”纱厂1000余名中国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我作为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工运部长，并以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大连地区有史以来，有领导、有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百日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翌年3月，经党组织多方面营救获释。

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我同一些幸免于难的党团员逃往奉天（沈阳），继续寻找党组织。1928年初，我在奉天兵工厂做工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由我担任工运部长，领导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当时，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由于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影响，处于低潮。许多地方党团组织被破坏，工会被解散，一些尚未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的地区，也因日本统治严酷，无法开展工作。我上任后，深入奉天、抚顺、辽阳、沟帮子、西丰等地的工厂、矿山和南满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同资本家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1928年4月，在满洲省临委第二

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省委常委,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不久,省临委接到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央给满洲省临委5个名额。当时,党内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通知要求最好选工人、农民作代表,使领导干部中多增加些工农成分。组织部长吴丽实找我商量派谁去合适,我刚到省委工作不久,全东北地区的情况尚不完全熟悉,这样,由吴丽实提名,决定让我、王福全、于治勋、朱秀春、张任光代表满洲省委出席这次会议,并由我负责带队。我们5个人中,除张任光是学生出身外,其余4人都是工人出身。

鉴于当时国内形势的紧张局面,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安排到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批前往莫斯科。当时行走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到苏联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从满洲里和绥芬河越境。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傍晚,我回到旅馆,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4人做了传达,之后他们先期过境,我则留在了哈尔滨。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见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

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

记不得是途中的哪一个大站,停车时,我们下车到站上去活动活动。一个苏联铁路工人见我们是中国人,一边用手比划着,嘴里一边发出俄语的卷舌音,我们不懂俄语,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直到火车又开了好长时间,才得知张作霖在沈阳被炸死了。

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到了莫斯科。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木架子马车把我们一行拉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代表,因为有几个省的代表还没有到,会议没有马上召开。有一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找到我,对我说:老唐,你怎么把团员也带来了?这时我方知朱秀春竟是个团员。我一时没了主意,问他:这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说,让朱秀春写个人入党申请书吧。就这样,经过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朱秀春在莫斯科加入了党组织。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政治报告(王明翻译),瞿秋白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之后,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长时间的讨论。

六大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我作为一个人党时间不长,从事省委工作时间很

短的工农干部,能够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特别是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心情非常激动。因此,开会的时候总是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我记得,中央报告中曾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听了以后,深感党中央的报告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7月6日,在职工问题讨论中,我简要谈了满洲职工运动的情况。我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一部分。东三省有许多大工厂、铁路和矿山,产业工人至少有50余万。像这样聚集了广大的产业工人的地区,如果我们党不注意它,把它放弃了,实在可惜。

东三省过去的职工运动之所以没有成绩可言,是因为我们党没有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小的斗争是有的。过去有行会性质工会的组织,现在连这样的工会也没有了。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以及我们党不太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所造成的。

从前党只注意南方如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工作,以为把南方工作做好了,可以进行北伐。其实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党注意南方各省的工作,我只是希望大会同样地关注满洲的职工运动。

我还介绍了当时满洲各地职工运动的情况:(一)大连。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策源地,有产业工人4万多人。大连过去有过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当上海和广东的工人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北方党和工会指导下的大连工人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北方所有的组织——党和工会都被破坏了(过去北方的组织,先有工会,后有党的组织)。这表现在三个时期:在1926年福纺纱厂大罢工时,我们党指导下的工会,援助罢工工人,结果使资本

家让步。但是党也受了部分损失,工会许多干部人才被捕。第二时期,经过第一时期工会的打击后,我们党领导工人重新恢复了工会的组织(1927年7月),但是又遭到更大的镇压,工会被封闭,工人被逮捕,党的组织被破坏。第三时期,1928年1月,党的组织重新恢复。但在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工人被捕四五十人,党组织可以说是没有了。不仅大连如此,从大连到长春的工会和党组织也受到摧残。(二)鞍山。鞍山工厂里的工人,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日本人,共约几千人,工作非常艰辛。(三)抚顺。抚顺的煤矿有千台以上的机器,4万多名工人。他们受到的压迫非常厉害,甚至受到警察督视。由于现实的压迫,这些工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四)本溪。产业工人的数目不清楚,但他们曾进行过斗争。这里的工厂是中日合办的,1927年因与奉系军阀发生冲突,日本打死了20个工人,工人们自发地举行罢工。(五)奉天。工人有7万多名,都是没有组织的。他们很信仰张大帅,但我们党始终没有去做工作。这些工人月薪仅有三四百万奉票,抵不过十几块现洋,生活非常困苦。他们也曾有过反对日本建立领事馆的示威游行,后来被张作霖镇压了下去。这些工人其实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宣传的。(六)哈尔滨。因为苏联的原因,哈尔滨铁路工人的生活是很好的,月薪在80元以上。但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并不容易。他们完全不懂得他们生活的好处,是苏联工人专政的原因。由于这些工人之上由管帮负责,管帮不允许我们去做工作。苏联将余款分给工人,遭到张作霖的反对,对于这一点,工人们并不知情。现在哈尔滨还有其他产业工人的组织。

在发言的结尾,我又再次地希望大会特别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代表更好地消化理解六大精神。中央领导同志不仅主持会议、作报告,还亲自给我们辅导。开会的20多天

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

时间里,我受到了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受到过的教育,也更增添了会后做好革命工作的信心。

大会闭幕前,选举了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7月11日,六大会议结束。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17日在莫斯科召开。应共产国际邀请,中国部分代表留下,继续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我是其中一个。我们留下的二十几人,住进了莫斯科国际旅馆。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工会大楼里召开的,中共代表苏兆征致了开幕词。这次会议大约开了一个半月。会后还组织代表进行了参观访问。我和苏联、意大利、德国等代表10余人分在一个小组里,参观了乌克兰的农业区。参观结束后。经海参崴返回中国。

这时,周恩来也从苏联回国。路经奉天时,他向满洲省委作了传达六大决议精神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和普遍组织武装起义,而是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高潮。他指出在政治上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且“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周恩来的报告为满洲省委的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即将召开的满洲省委党代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几个参加六大的代表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六大精神。省临委书记陈为人根据六大精神,总结和检查了前一段省委的工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省委《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和《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并决定改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我仍任工运部长。

满洲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过去急于组织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省委努力于工农运动和反日运动的领导,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对内部的训练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满洲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

同年12月,为进一步贯彻六大精神,总结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黄土坑附近党员牛思玉家召开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冲进十几个警察包围了会场。除一人脱险外,省委书记陈为人等13人被捕。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1929年夏,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我和被捕的同志一起出狱。之后,我又重新投入到满洲省委领导的工人运动之中。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



唐韵超 1901年1月生。辽宁旅大金县(今大连金州)董家沟唐家屯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回国工作。1931年2月因参与分裂党的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7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其中央委员资格。1945年1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劳保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1951年8月后被撤职。1952年8月被开除党籍,并以渎职罪判刑6年。1980年11月经中共中央复审,批准撤销原判恢复党籍,给予平反。担任本溪市政协委员至1983年10月。2005年2月16日在辽宁大连因病逝世。

忆广州的革命斗争和参加 中共六大

黎国忠^①

1925年,我在广州大冲口惠民机器教养院(即工厂)做学徒。六二三沙基惨案后,李佩堪介绍我入团入党(当时党团员并无严格区别,都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也算是入党)。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举办劳动童子团。李沛群、何学榮(两人也是学徒)与我在黄沙劳动同德总工会童子团内兼搞教育工作,李教文科,何(后被敌人杀害)教音乐,我教体育。

1926年秋,惠民机器教养院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恢复电器、绘图教员职务,目的是恢复原有工厂章程。当时,冯菊坡(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积极支持我们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了八个月,直到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仍未复工。

“四一五”后,我在广州不能立足,由惠民机器教养院工程师李其环介绍到汕关崎禄外马路国民党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制弹厂(是一间反动工厂)工作,便与组织失去联系。1927年

秋,工厂负责人听说海陆丰农民暴动,将夺取汕头市,因而逃走。有些工人(如郭庭瑞)也拆机器零件走。我劝告工人不要走,宣传说共产党如果来到汕头,是会保护工人利益的,所以许多工人仍留在厂内。过了两三日,海陆丰农军没有来到汕头,工厂负责人回厂。我因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不能继续留在此地,暂回广州父亲处(他是开猪肉店的小商贩)。不久,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单线与我联系,指派我到河南均和安、协同和等工厂做团结工人的工作。我在厂内团结了一批青年工人,通过宣传教育认清形势,准备参加革命斗争。

1928年5月,吴毅通知我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我一人到香港,与省委机关接上头。一个女同志(已忘记其名字)负责接待。在港住宿一夜,邝壁清(庇利船厂打磨工人)和我两人到上海找到接头机关。当时联系的办法是这样:到接头处,我向该处人员借火柴抽烟,他给一个火柴盒与我,盒内藏一枝半

^① 后改名为黎忠,1964年5月16日接受采访时任广州市公共汽车修配厂五金车间调度员。

火柴,我把半支火柴递回给他,他再给回我,就表示正式联系上(当时没有写介绍信)。我俩在上海法大、广泰来等旅店住了三周,学讲普通话(因东北是军阀及日本势力范围,他们最怕广东人,一听到广东音就严加防范,所以凡是广东代表都要先学普通话)。以后,我和邝壁清及一个外省人(忘记其名字)乔装失业工人,经大连、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与联系机关接头,由他们派马车运送我们三人越过国境线到达苏联的赤塔。我们改穿俄国工人服装,以侨居苏联的老华侨身份出现,坐上国际快车(火车)(车窗放下布帘,防止外人认识我们),经五昼夜旅程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某旅店,我们又住宿一夜。翌日即有一辆货车(车四周放下布帘)载我们到郊区农村一间大房子里。

参加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团成员有十几个人,我还记得的有李立三(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好像是团长)、阮啸仙(省委委员)、黄灼(曾任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副官、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共广东省委工委书记)、杨殷、周秀珠、袁炳辉、江惠芳、邝壁清和我。

六大会议上,有一横额,上书“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会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中共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张国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等发言,提出今后革命的目标任务与策略方针。大会开了十几天,最后全体代表举手通过“六大决议”即告结束。

会后,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惠芳、袁炳辉和我曾到列宁格勒参观。

六大代表分散回国。杨殷和我一路,他乔装成老板,我作伙计,回到满洲里。警察盘问我

们去哪里,干什么?杨殷说是广生堂想在此开支行,到此先调查。警察打开藤箱一看,内藏许多广生堂牌贴及该堂出产的雪花膏、香水,便信以为真,让我们通行。我们到上海,被青红帮以搬行李送到旅店为借口勒索数十元。杨殷找到一些青红帮帮头说话,只还给几元了事。后来,杨殷留在上海,我回香港。

我到九龙上海街党的机关报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与我联系。他分配我到九龙船坞工作,做支部宣传委员(支部书记为曾启)。李甫是锅炉工人,可能是锅炉工场党支书。那里也有几个党员。

当时,我们没有开展罢工斗争,只发动工人反对包工头的“大鸡公主义”(即工人找工做要送酒送鸡等礼物与工头)及反对猪仔头的中间剥削。支部出版《手铤特刊》(由陈×年主编),报道工头的剥削情况及工人斗争现状。

1929年10月,香港工人代表大会在九龙东山庙开会,主持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冯菊坡(后改名马汝清)、文沛(省委委员)、周颂年(省委委员),参加开会的代表有50人。曾启和我都参加。因叛徒陈顺(现仍在九龙船坞做工)向敌人告密,到会代表全部为英警所逮捕。除曾启是香港本地出生没被驱逐外,其余都被逐出境。我们分别到了上海、厦门、福州、江门等地。我则回到故乡新会县第二区江门,自此即脱离组织。1951年,我在香港合众五金厂重新入党,1958年回广州工作,任广州市公共汽车修配厂五金车间调度员,定居在广州市东山区东华东路梅花巷。

何锦洲采访并整理,由何锦洲提供

黎国忠 出生年月不详。广东新会江门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举办劳动童子团，参加黄沙劳动同德总工会童子团的教育工作。同年秋参加惠民机器教养院的工人罢工，坚持罢工斗争八个月。1928年5月到莫斯科，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10月参加香港工人代表大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港英当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到故乡后脱离党组织。1951年，在香港合众五金厂重新入党。1958年回广州，任广州市公共汽车修配厂五金车间调度员，定居在广州市东山区东华东路梅花巷。后情况不明。

出席党的六大和传达六大精神

罗 明

1928年3月,福建省委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参加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福建省委选举我和印刷工人、省委委员许土森为代表。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孟坚(孟用潜)作为共青团代表参加。

4月间,我和许土森离开厦门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了20多天,才由交通员带我们乘车去满洲里。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地,我们是晚上爬山过边界的。事先,交通员提醒我们不要咳嗽,而当时许土森患肺病,咳得很厉害,过边界时,只好捂住嘴。

到达苏联境内的火车站,我们见到了李富春、蔡和森等同志,大家一起乘火车于同年6月初抵莫斯科。孟坚是从另一个地方越过边界,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的。当时莫斯科的生活条件很差,物质供应缺乏,连香烟、火柴都买不到。

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原庄园主的房子(像是别墅)里举行的。6月17日,召集了各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我是福建代表团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通过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名单和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的名单等。

6月18日,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议由向忠

发主持。我记得参加大会开幕式的,除我党来自各地的代表外,还有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苏联党的代表。开幕式后,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报告。他的发言稿经斯大林同志看过。大会对他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中央政治报告是由瞿秋白同志作的。记得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作了两个报告:一是组织问题报告;一是军事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搞游击战争很有成绩,它代表今后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

六大大会主席团下设了好几个委员会。我参加了政治委员会。除政治委员会外,还有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

大会对每个代表编有代号,我是18号。

大会从6月21日起对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的中央政治报告进行讨论。6月25日,我在讨论会上作了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主要内容是:

第一,谈到福建党由于历史短,得到上级党的指导和帮助又少,如1927年从3月到8月,中间有6个月与上级失了联系,所以力量薄弱,工作幼稚,在对国民党工作、改造党的工作、组织暴动和军事运动、反帝运动等方面都有错误。

第二,谈到对中央策略的意见。八七会议以前,对中央机会主义的策略,福建同志是一致反对的。八七会议以后,中央的暴动策略是对的,但对策略的应用没有明白的指示,所以福建党部在执行此策略时有错误。

第三,向大会介绍了福建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情况。谈到白色恐怖厉害,秘密工会和党的支部极难发展,工人斗争成绩少。而农会及党在农村中的组织甚易发展,在农村很容易由小的斗争转变到武装斗争。

第四,对今后策略的意见。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问题,我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

关于革命的高潮与低落问题,我认为应把“现在已经高涨”与“可以高涨”两层分别清楚。根据福建的情形看:(1)统治阶级矛盾很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稳定。(2)改良主义不能实现。因而可以断定革命的潮流不久便可以高涨,不过究竟到什么时候高涨,高涨的程度如何,那就要看我们的主观力量而定。

政治报告的讨论将要结束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再设一个小委员会,即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由41人组成,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后来,大会决定把12月11日作为广州暴动纪念日。

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的组织报告,详细地讲了各地党组织状况,其中提到福建省已建立了两个市委(福州、厦门)、12个县委和6个特别支部。党员人数共计1800人。

大会的最后两项是通过决议案和选举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11日举行闭幕式。大会讲到形势和任务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并发

布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十大纲领。

六大召开前后,代表们曾到苏联各地参观。不幸的是许士森同志因患肺病,苏联天气又较冷,到莫斯科后病情加重,会议期间送高加索医治无效病故。

六大结束时,周恩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愿不愿意留在苏联学习?我考虑了一下回答:福建只来了两个党的代表,现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应回去传达六大精神,执行六大决议。另外,南昌起义后,你(指周恩来)到上杭时给我们留下好几十支枪,让我们在闽西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这事我已经布置好了,要回去把武装斗争搞起来。我本人是愿意留下来学习的,但是,回去打游击也是学习。周恩来同志听后说:好,你回去吧。

大会后,福建派去参加六大的青年团代表孟坚调到东北地区工作。这就更加重了我回福建传达贯彻六大精神的任务。

六大结束后,我和浙江代表一起经海参崴回国。先到上海,在上海听中央秘书处的同志讲,郑超麟(福建人,留法学生,当时编辑《向导》,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拥护者)在我去参加六大以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福建召开省代表会议,改选了省委,由刘谦初任省委书记。有人还提出要撤销我的六大代表资格,认为我对平和暴动的意义估计不足,却又发动进攻县城,认为我这个观点是犯右倾错误。郑超麟同意了 this 意见,并报告了中央和六大秘书长周恩来同志。这样我才联想到为什么周恩来同志要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在莫斯科学习。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便问负责与我接头的同志,现在安排我去哪里工作?他说,你还是回福建传达六大精神。

大约10月间,交通带我回到福州。这时,福建省委机关已经从厦门搬到福州,刘谦初当时也在福州。邱泮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省委便